

A Dialogue

Between The Tao And The Logos

“道”与“逻各斯”的对话

——汉英翻译与中西文化散论

张传彪 著



國防工業出版社

National Defense Industry Press

本专著获宁德师范学院 2012 年度校级重点科研课题资助

“道”与“逻各斯”的对话

——汉英翻译与中西文化散论

A Dialogue Between The Tao And The Logos

张传彪 著



国防工业出版社
National Defense Industry Press

内 容 简 介

本书共12章,分上、下两篇。“上篇”主要围绕汉英两种语言本体性差异对各自民族的语言思维、文化传统、审美心理及其对英汉翻译实践的深层影响展开探讨,其中既有形而下的实例剖析,也有形而上的学理思辨。“下篇”则主要侧重汉英互译实践所涉及的具体策略、方法与技巧的讨论。

本书适合英语专业本科生、研究生,英语教师及广大外语爱好者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道”与“逻各斯”的对话:汉英翻译与中西文化散论/张传彪著. —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12.12

ISBN 978-7-118-08579-2

I. ①“道”... II. ①张... III. ①英语—翻译—研究 IV. ①H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01964号

“道”与“逻各斯”的对话——汉英翻译与中西文化散论

张传彪 著

出版发行 国防工业出版社
责任编辑 郑艳杰
地址邮编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南路23号 100048
经 售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嘉恒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9¼
字 数 268
版 印 次 2012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 1—4000册
定 价 32.00元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我社负责调换)

国防书店:(010)88540777

发行邮购:(010)88540776

发行传真:(010)88540755

投稿电话:(010)88540632


序(一)

我与张传彪先生相识多年,最初是在《中国翻译》、《上海翻译》、《中国科技翻译》、《外语研究》以及多所大学学报上看到他发表的笔锋犀利、文采飞扬的文章,他的名字引起了我的注意。后来又多次在学术会议上相遇,还有过一次他主持我讲话的合作经历。去年底在参加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翻译与跨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们又不期而遇,在会场内外,在布里斯班河游艇上,我们一起度过了非常难忘的时光。正是在那次会议上,他告诉我正在撰写一部专著,可望一年内完稿。

张传彪先生治学严谨,且才思敏捷,果然不到一年,便完成并给我发来了书稿《“道”与“逻各斯”的对话》。为此书作序,实在不敢,但抱着学习的心态细细读来,不觉兴味盎然。我发现此书学术性、实用性、可读性皆佳,且颇有新意,于是欣然命笔,写下一些感想文字。

《“道”与“逻各斯”的对话》内容丰富,例证翔实,涉及到中西文化对比、汉英翻译、诗歌美学、外语教育等领域。其中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关于发挥译者主体性作用与翻译变通的那些章节。当然,这不是因为此类话题别人没有写过,而是因为其中许多精彩译例作者不是靠东摘西抄、拾人牙慧,而是出自自己手笔,且大都与众不同。比如,书中所举双关语的翻译,对福建海峡卫视 Straits Express 栏目例句的改译,等等。即使在话题内容异常大众化的“汉英数字对比与翻译散谈”一章中,作者也能做到化陈腐为神奇,频频亮出独辟蹊径的创新性观点,让人耳目一新。

不妨举几个例子:比如英语幽默双关句 Marriage is an institution where a man loses his bachelor's degree and a woman gets her master's



status 之译“婚姻是一所医学院——男生入学主修‘气管炎’，女生入学主攻‘肤必治’”，让人读后捧腹叫绝。再比如，在讨论被无数人讨论过千百遍的修辞性数字翻译的话题中，作者开拓性地提出了“虚化数字的语言任意性特征”、“虚化数字的历时性特征”、“虚化数字的民族性特征”、“虚化数字的模糊性特征”，甚至大胆设想虚化数字还可能有“跨国界、跨文化的传染性特征”，等等。而对修辞性数字的类似论述可谓绝无仅有。

《“道”与“逻各斯”的对话》一书不乏创意，书中有新论题、新观点，也有老论题的新视角，还有更多的新材料、新例证，不少观点具有“颠覆之再颠覆、解构之复解构”的胆识。论著的创意源于作者的创新思维和能力。张传彪先生的创新思维和能力表现为他勇于质疑现有结论的锐气、善于捕捉漏洞的底气和敢于标新立异的胆气。这三“气”难能可贵。学术问题往往越辩越明，正是在不断“质疑”、“补漏”、“立异”中得以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在不断的“否定再否定”中向前发展。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葛传棻先生当年的“学术锋芒”。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一位未受过正规教育的中国青年竟写信质疑英国语言学界泰斗 Fowler 先生，指出他的权威词典 *King's English* 里几十处错误，他就是后来成了复旦大学外文系三巨头之一的葛传棻教授。此事一时传为佳话。Fowler 先生接受挑战、容纳质疑的雅量也同样令人难忘，他高度评价葛传棻的信：“Your letter is in faultless English, and, long as it is, nowhere betrays that its writer is not an Englishman.”为了比较和鉴别，张传彪先生的书中也有大量对不同译例的评析和与有关译家的商榷。这些评析和商榷只是就译论译的讨论，虽辞锋锐利却并无恶意。相信书中所提及的专家、学者必有包容不同观点的胸怀，张先生也必有接受再质疑、再商榷的气度。

张传彪先生的新作以《“道”与“逻各斯”的对话》为书名很耐人寻味。

很多著名译家以“道”与“逻各斯”互译,可见二者有共同、相通之处。它们都指带神秘色彩的生成万物的宇宙本源,它们也都有“道路”的涵义。但二者在东西方按不同的轨迹发展,以不同的方式诠释,形成了不同的宇宙观、哲学观和语言观,产生了东西方不同的语言和文化。姚小平(1992)指出,“道”与“逻各斯”是一条道路,也是两条道路,此说很有见地。张传彪先生在二者的“对话”中主要强调了二者的个性和差异,可谓洋洋洒洒,条分缕析,对“两条道路”的论述令人印象深刻。书中也提到了二者的共性和融合,但笔墨不多。张传彪先生是位多产学者,从2004年至今的短短几年间,已发表了近百篇学术论文,我们期待着他在未来的学术道路上继续披荆斩棘,在那另外的“一条道路”上为我们奉献一部“道”与“逻各斯”对话的新篇。

左飏

于上海浦东寓中

2012年10月

(左飏先生系上海海事大学教授、资深翻译家)

序(二)

我与张传彪君初次相识是在中科院新疆分院的全国科技翻译研讨会上。自那之后我们在北京、烟台、澳门、台北等地的学术会议上又多次相会，足迹几乎遍及全国，可谓同道故交。

记得2009年在台湾辅仁大学举办的第三届“两岸四地”翻译与跨文化交流研讨会上，本人恰巧担任张先生发言的那个分会场主持人，第一次感受到他那与众不同的思辨风格——观点鲜明、文笔犀利、阐述透彻，而且更可贵的是他对待学术话题求真求实，不吐不快，可谓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在张教授的这本《“道”与“逻各斯”的对话》中，我再次感受到这种酣畅淋漓的独特文风。

中西译学各有其迥然相异的源流，我们在引进西方译论、学其长处的时候，决不当无视甚或丢弃自己的传统。可惜的是，不少人，特别是青年学者，一味跟风，而对中国自己的文化传统却不甚了了。从书中可以看到，张教授以极大的学术魄力，在中西译论之间进行了一番别具特色的散点式对比，堪为青年学者之楷模。书中内容涉及到从汉字语境质疑后现代解构主义、中西诗歌迥异根源于文字差异、译诗贵传神而非机械转述，以及语言的局限性、冷思考异化策略、变通乃翻译本体性特征等重大议题，其中尤以对翻译的深层次思考鞭辟入里，实在难能可贵。

哲学基础不同，翻译观、理论形态自然也会呈现出本质差异。比如翻译策略中的归化异化问题，按许多西方人的见解，二者必居其一，非此即彼；而以中国哲学为基础，归异虽对立却必然互补才是正确且合乎实际的。

常见人用目的论作为理论基础撰写文章，在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中



尤为显著，我们不妨看看中西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的差异。翻译目的论20世纪70年代诞生于德国，属于功能派，其发展在20余年中经历了两代多人的传承，在20世纪末趋于成熟并产生世界性影响。但是，目的论却有一个明显的缺点。

我们清楚地看到，翻译和婚姻一样，非常复杂，其目的是分为多个层次的。层次与境界相连，高与低不可同日而语。低层次的翻译，怎能和高层次者等量齐观？西方人不强调这一点，因为他们有自由、平等、人权等观念的束缚，似乎译者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可以选其所译，并按自己的具体目的确定翻译策略。自由、平等、人权等观念我们也同样尊重，“对话”就是“平等”交流嘛，但不必要对这些观念尊重得过了头而产生谬误，明明有高有低、有重有轻也不去说，弄得年轻人一头雾水。如果目的是为了飨读者以高质量的译文，不仅信达且更至雅，用涉及社会重大问题的译文来为社会的改革与进步提供参考，乃至引进域外的驱动力，那么这种目的自然属于高层次。译者在科学精神、社会责任、学术造诣、个人修养等各个方面都应达到高标准，才有资格翻译。


翻译的目的，纷繁复杂，难于罗列净尽，但就其境界的高低，我们可以粗线条地排出几档，聊表大意，冀飨读者以些许的启发。第一种，胸怀天下，为促进人类的文明；第二种，忧国忧民，为推动本国的进步；第三种，怀抱事业，为研究自己的领域；第四种，名誉当先，为走在人前面上有光；第五种，利字挂帅，或为评职或为挣钱；第六种，文化侵略，为殖民统治充当帮凶。

茅盾在论述艺术意境的传达时说，“这样的翻译，自然不是单纯技术性的语言外形的变易，而是要求译者通过原作的语言外形，深刻地体会了原作者的艺术创造的过程，把握住原作的精神，在自己的思想、感情、生活体验中找到最适合的印证，然后运用适合于原作风格的文学语言，

把原作的内容与形式正确无遗地再现出来。这样的翻译的过程,是把译者和原作者合而为一,好像原作者用另外一国文字写自己的作品。”(茅盾,《翻译通讯》编辑部,《翻译研究论文集》(1949—1983),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10)

辜正坤站在中西文化交流互惠的高度说:“中西文化像男人和女人的关系一样。当双方具有了性觉醒意识之后,西方文化像男人离不开女人一样离不开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像女人离不开男人一样离不开西方文化。”(辜正坤,《中西文化比较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70)辜先生还引诗人歌德的话作为印证:“只有永恒的女性,才是我们前进的领路人。”(ibid)实际上,在西方意识到中国文化价值的大有人在。辜先生据此得出结论:“在阳性文化里,必有女性中心主义作为补充。/在阴性文化里,必有男性中心主义作为补充。/世界文化缺乏了中西文化的任何一极,都是灾难。”(辜正坤,2007:170)

张教授的书中有多章的内容涉及到中西方诗歌对比与翻译。尽管类似的立论和评析在外语学界和文学批评界并不少见,然而,能够像该书这样从汉、英语言文字的源头入手,旁征博引,进行深入、透彻、高屋建瓴般论证与阐释者却实属罕见。比如第2章“从汉字本源看中西方诗歌之迥异”,其所探讨的是中西方诗歌从体裁、篇幅、题材、到风格何以相异的根源所在。实际上,涉猎过该话题的作者并不在少数,却唯有传彪君与众不同,独辟蹊径,突发奇想——:“如果当初仓颉造字时造的不是象形方块字而是字母拼音文字,那么汉语诗歌的发展轨迹还会是一样的吗?”进而设问:“到底是汉字汉语的独特属性让诗人们找到了最能发挥这种文字优势的诗歌形式和体裁?还是历代中国诗人受汉民族传统哲学、美学影响,受儒家‘子不语:怪、力、乱、神’思想影响,有意回避史诗和叙事长诗的创作?”诸如此类别出心裁的逆向思维与发散性思维,在



《“道”与“逻各斯”的对话》中几乎随处可见。再比如，在第9章“望文生义：中国人语言认知的本能”中，作者对成语“望文生义”的词典定义进行了追本溯源、引经据典式的剖解，提出了截然相反的颠覆性结论。虽然本人对张君大胆质疑权威的个别观点未敢苟同，却为其严谨执着的求真精神深深感动。这，便是该书留给我的最深刻印象，也是本人爱上此书的重要原因。

是为序。

孙迎春

于山东大学(威海)

2012年10月

(孙迎春先生系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 前言 ◎

语言是人类对无限宇宙的有限表述。作为一种人类公器,语言在其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必然被各个民族赋予各自历史、文化、宗教、社会的意义。因而,不同民族的语言体现着不同民族看待世界的文化眼光,同时也体现了不同的世界观。正因此,凡涉及语言、文化与翻译的争论总是很难“一言以蔽之”。

笔者深知,讨论英汉翻译与中西文化对比的话题殊难讨好,惹来争议甚至非议在所难免。好在眼下学术争鸣的氛围尚属宽松,尽管仍有忐忑不安,我还是鼓足了勇气把自己的观点和盘端出。诚恳希望外语学界同仁与广大读者提出批评。

本书分上、下两篇,共 12 章。“上篇”主要围绕汉英两种语言的本体性差异及其对各自民族的思维方式、审美心理、文化传统,以及英汉翻译转换的影响展开讨论,既有形而下的实例剖析,也有形而上的学理思辨。“下篇”则侧重英汉翻译实践的具体策略、方法与技巧。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探讨英汉翻译,难免要涉及一些不同效果的译例。这样做绝非有意跟哪位译者为难。如果因此冒犯了他们,我愿意在这里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歉意。

本书初稿今年 9 月份才完成。商务印书馆接到电子书稿后不久即表示有意出版该书,但鉴于笔者退休在即,执意坚持该书务必在 2012 年底之前出版,故不得不与之失之交臂。尽管如此,我还是要衷心感谢商务印书馆张显奎编辑和英语编辑室栾奇主任对本书稿的厚爱和悉心审读。当然,我更应该感谢国防工业出版社对出版这本专著的重视和慷慨



支持。谢谢你们，郑艳杰编辑和刘华副总编！

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笔者的大学同窗廖晓天君不辞辛苦，帮忙审读了部分书稿，并对其中若干句例提出宝贵改进意见，谨在此表示真挚谢忱。此外，我也要对女儿张巧立说一声“谢谢”，几年来她一直默默地帮我查阅文献资料，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最后，我要特别向欣然为我写序的上海海事大学资深翻译家左颀教授和山东大学博导孙迎春教授表示衷心的感谢。

张传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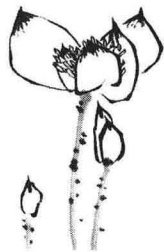
2012年10月13日

目 录

CONTENTS

上篇 汉英对比与翻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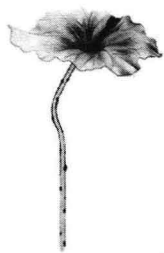
- 第 1 章 对汉字语境下文学翻译与解构主义的思考 3
第 2 章 从汉字本源看中西方诗歌之迥异 20
第 3 章 论“道”与“逻各斯”的共处 ——从汉字语境看西方译学理论 36
第 4 章 贵在神韵话译诗 51
第 5 章 对语言局限性的译学思考 94
第 6 章 外宣文本变译探析 111



下篇 译事散论

- 第 7 章 文化语义:语言背后的语言 137
第 8 章 变通乃翻译基本属性 161
第 9 章 望文生义:中国人语言认知的本能 179
第 10 章 对“异化”翻译策略的冷思考 196
第 11 章 汉英语体翻译研究的一个误区 221
第 12 章 汉英数字对比与翻译散谈 234
附录一 261
附录二 271
后记 279





上篇 汉英对比与翻译

- 对汉字语境下文学翻译与解构主义的思考
- 从汉字本源看中西方诗歌之迥异
- 论“道”与“逻各斯”的共处 ——从汉字语境看西方译学理论
- 贵在神韵话译诗
- 对语言局限性的译学思考
- 外宣文本变译探析





第 1 章

对汉字语境下文学翻译与解构主义的思考

解构主义能在当下译界大行其道,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找到了可以百发百中的廉价标靶——“信(忠实)”。尽管古今中外从来不曾有谁果真是以数学般的“精确”实践过“忠实”翻译,传统译论中出于简约而被浓缩成“信”或“忠实”的翻译主张还是被“解构”得死去活来。

文学是文学家虚构出来的世界,并无精确可言。而语言则是人类对无限宇宙的有限表述,字字精确也绝非易事。然而,恰恰就是在这毫无精确可言的文学翻译领域,后现代解构主义锋芒毕露。德里达(J. Derrida)对西方传统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颠覆,发轫于其所杜撰的 *différance* 一词。这是一个在西方写音语境下可以读、可以写,但不能够听,也不能够在言说中被理解的毫无意义的自由符号。一个子虚乌有之词居然可以导致西方诗学形而上学的思想大厦发生动摇,这在普通中国人听来简直天方夜谭。然而,正是这个肇始于 *différance* 的文字游戏居然成就了一代宗师的解构主义哲学阐释学,并从根本上引发了一场让西方哲学界、诗学界、美学界的学者、哲人们灵魂震荡的“大地震”。

笔者不止一次暗自设问:如果中国也出一个德里达,也采用类似 *différance* 的汉字游戏,此君能够在汉语写意语境下建构起自己的某个理论体系吗?或者颠覆东方大陆哪怕最不起眼的哲学命题吗?在德里达眼里,西方文化两千多年来始终没有摆脱逻各斯语音中心主义和在场形而上学的困扰,原因很简单,西方阐释主体言说所表达的“意义”即是“在场”,“在场”的“意义”源于“逻各斯”,“逻各斯”的本质是语音。而西方拼音文字则是对逻各斯“言说”的声音的书写和记录。这,便是德里达为什么要生造出一个 *différance*,并据此证明书写可以脱离挟带意义的语音,从而证明书写是远离“逻各斯”中心意义的外在衍生物。易言之,德里达的 *différance* 让书写摆脱了语音的控制,使得言说与书写之间因“延迟”而产生了“差异”。德里达的这种思辨逻辑用之于翻译,则是

证明了文本不是一个“在场”所限定的结构，而是一个始终处于不确定性之中的“异延”世界。由此推演，读者所看到的永远都是似是而非或似非而是的“踪迹”，“在可能或看来可能的范围内，翻译所从事的就是所指和能指之间的异延。”(Derrida, 1981)换句话说，所有翻译都不可能传达出作者意义的本真世界。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继续讨论。

现在，让我们把视野收回到东方大陆的汉字语境。在华夏五千年的文化传统中，有谁能找到一个类似西方形而上学的先验中心可供解构？没有。有谁能找到一个具有终极性话语权力的语音中心值得解构？没有。请问，在没有终极标靶的汉字语境下，硬是找来一个文学文本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或是硬把跟什么“中心”都沾不上边，纯属翻译伦理标准的“信”与“忠实”解构得死去活来，到底意义何在呢？

1. 对中、西方文字本体性差异的思考

《外国语》2005年第3期上刘云虹博士的《意义与翻译批评研究》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意义是开放的，没有一种意义是固定不变的，……每一代人，每一个译者都必须以新的、特有的方式去理解历史流传下来的文本。”(刘云虹, 2005) 该文还特意引述伽达默尔所言：“没有什么东西有如文字这样生疏而同时需要理解。甚至与操陌生语言的人接触，也不能与这样一种生疏性和陌生性相比较。……本文的意义超越它的作者，这并不是暂时的，而是永远如此的。”(ibid) 笔者对此实在不敢苟同。

西方语言学认为，语言是思维的符号，文字记录语言，是“符号的符号”。因此，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仅仅记录语言，只能是第二性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家F·索绪尔在其《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中就指出：“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在于表现前者。语言学的对象不是书写的词和口语说的词的结合，而是后者单独构成的。”(索绪尔, 1980)

西方民族认识世界的方式是概念直接联系语音，然后用文字把语音记录下来(拼音文字)；汉民族认识世界的方式则是从概念直接到文字(象形文字)，语音不过是附属物。对汉字汉语而言，上述情形恰恰应该颠倒过来：文字是第一性的，语音才是第二性的。一个明摆的事实是，主宰中国书面表达数千年的“文言文”就完全脱离口头语言。实际上，在中